

# 「崇實」作為一種批評方法—— 論《四庫全書總目》「楚辭類」 提要呈現之文學思想<sup>\*</sup>

許嘉瑋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 提 要

本文旨在考察當今《總目》學中較少被關注的楚辭類著作，並以《四庫全書》編纂時的重要思潮——崇實，作為分析討論的切入點。「崇實」雖為一種風氣，在不同領域、面向開展，又足以作為一種具體的操作方法。透過集部〈總敘〉、〈楚辭類敘〉，確實可見「崇實」概念流動其間，此處之「實」同時包含作品文本自身的版本考據外，也必須考慮其外延的歷史環境，以便於知人論世。從中可看出文學除卻藝術性的要求外，如世道教化、文人爭譽的實用性的功能更不容忽視。

藉由兩篇敘文的概括，重新檢視楚辭類提要，嘗試考掘「崇實」思想主要展

---

\* 本文為參與曾守正教授主持之國科會研究計畫「眾水歸海：《四庫全書總目》「集部」文學思想的凝結歷程」（NSC100-2628-H-004-087-MY3）之相關成果。撰文期間，得與曾守正教授及學友邱怡瑄、曾令愉相互討論，又蒙渥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修訂意見，對不足之處多所提攜，於此謹致謝忱。

現在哪些部份，館臣又是透過何種辭彙來進行具體批評。據此，發現「考據訓詁」與「本意寄託」為兩條主要脈絡，前者著重篇次字句等基礎，後者則考量到作者與註解者的遭遇、情性之真實。簡言之，館臣們之苦心表現在文學審美與版本考徵的微妙調和，卻又涵蓋在能為清廷所用的前提下，達到文本內、外的平衡。由提要之評價可知，當考據與本意產生衝突時，當以本意為宗，這種詮釋進路將作品與作者（註本與註解者）緊密結合，突顯忠愛纏綿的「靈均旨趣」，最後歸向有益於清廷統治之用。

**關鍵詞：**四庫總目提要 楚辭 崇實 考據訓詁 本意寄託

# 「崇實」作為一種批評方法—— 論《四庫全書總目》「楚辭類」 提要呈現之文學思想

許嘉瑋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 一、前言

《四庫全書總目》（下文簡稱《總目》）為清中葉官方編訂纂修《四庫全書》後重要的目錄成果，而從館臣撰寫之提要，亦可略窺清人的學問門徑，深具研究價值。據陳曉華的研究，《總目》成學已約莫二百餘年，20世紀80年代後，研究進路也從文獻目錄、補證校勘，到不同版本之間差異的比較，同時也帶入學術思想、文學批評與文化蘊涵等多元議題，使得《總目》學日趨豐富。<sup>①</sup>

然而，由於《總目》內容龐大，猶有許多論題可資深掘。除卻以往較受矚目的經、史二部外，有關《總目》集部之相關討論，近年來也已出現不少研究成果。若暫且排除集部提要文字的比對校勘與所收總、別集作品之考證外，圍繞文學領域開展新視野者，亦有相當數量。這些論著或從整體角度觀察《總目》集部的文

---

① 簡言之，也可以說學界的關注焦點，逐漸從文本內部轉向內、外的對照，但無論是專注於版本校勘，或爬梳其中的學術思想，仍有待學界群策群力，增加《總目》研究之深、廣度。前引有關《總目》學之研究概況，可參考陳曉華：《「四庫總目學」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頁460-481。

學思想、批評、鑑賞等課題<sup>②</sup>，或各自針對別集類<sup>③</sup>、總集類<sup>④</sup>、詩文評類<sup>⑤</sup>、詞曲類<sup>⑥</sup>四類提要進行考索，而楚辭類的研究則較為罕見。

蓋以楚辭類提要內容篇幅較為短小，份量恐不足以用專著形式呈現，而單篇論文部分據目前知見，僅李金善與郭丹兩人之作，故仍有開展空間。李、郭主要論述集中於二：其一、收錄與存目書的時代、數量差異；其二、館臣對從漢至宋以考據為主的註本較為推崇，不喜從宋至清以發揮義理、自出新意的詮釋進路。二者均指出館臣於明清相關註本多所貶抑，點出不錄明人之作，乃《四庫全書總目》之通則。<sup>⑦</sup>不過仔細比對敘文與各書提要，尚有可發揮處。如稱明清有許多重

- 
- ② 如龔詩堯：《《四庫全書總目》之文學批評研究》（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05年）。薛建發：《《四庫全書總目》文學鑑賞研究》（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應用語言文學所語文教學碩士學位班碩士論文，2006年）。也有集中《總目》對某一朝代之文學思想者，如何宗美、劉敬：〈《四庫全書總目》中的明代文學思想辨析〉，《江西社會科學》，2010年第9期，頁102-111。
- ③ 如曾守正：〈被隱藏的聯繫性：《四庫全書總目》唐代別集提要的文學史敘述〉，《淡江中文學報》，第21期，2009年12月，頁119-152。〔日〕笈文生、野村鮎子：《四庫提要北宋五十家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2年）。〔日〕笈文生、野村鮎子：《四庫提要南宋五十家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6年）。
- ④ 如曾守正：〈複述與新塑：《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清帝御定書〈提要〉的文學思想〉，《書目季刊》，第41卷第2期，2007年9月，頁67-88。鄭柏彥：《中國古代選本中「古」義的內涵、特性及其衍生的批評效用——以《四庫全書》「總集類」為研究範圍》，《嘉大中文學報》，第3期，2010年3月，頁245-271。
- ⑤ 如廖棟樑與曾聖益皆有相關討論，二文分見〈《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敘》對文學批評的認識〉，《輔仁國文學報》，第9期，1993年6月，頁109-131。〈從《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看中國詩文論著之特性〉，《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第2卷第2期，1995年12月，頁67-75、第2卷第3期，1996年3月，頁48-53。近期則以曾守正之專著較為全面討論「詩文評類」的文學思想，參氏著：《權力、知識與批評史圖像——《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的文學思想》（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8年）。
- ⑥ 如包根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歷代詞家評論探析〉，《輔仁國文學報》，第9期，1993年6月，頁53-108。孫紀文：〈《四庫全書總目》中的詞籍批評〉，《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第27卷第6期（2006年11月），頁161-164。盧盈君：《《四庫全書總目》詞曲觀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 ⑦ 詳參李金善：〈楚辭學史的濫觴——《四庫全書總目》之楚辭論〉，《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4卷第1期（1999年3月），頁54-57。郭丹：〈《四庫全書總目》中的

要註本未收入，是缺失也是遺憾的說法。本文以為不宜全然以現代的標準來批評館臣之得失，畢竟「寓禁於徵」或非最初目的，而是逐漸確定、落實的編纂方向。<sup>⑧</sup>又如郭丹以為清代王夫之、戴震、蔣驥的楚辭學著作可說是清代最重要者，前二者卻未獲收錄。實則，王夫之深山隱居，他的著作真正發揮影響力，須至晚清。況由四庫所收書情況觀之，如《詩經稗疏》、《春秋稗疏》等作品皆收入經部，清廷對這位遺民並非一無所知。<sup>⑨</sup>此外，又收錄強調由「尊王」轉向「攘夷」之作——《春秋稗疏》<sup>⑩</sup>，姑且不論是否對其進行刪改，身處「鼎革之際」，又具「遺民」身分的王夫之，被視為經學家，而非文學家，或許跟總敘主張文學不貽害教化人心、邦國有關。簡言之，儘管《總目》對明人著作貶多於褒，但明人著作在清代是否重要，很難用「後代」眼光進行評判。故有必要檢視編纂《總目》時背後之學術思想，並且結合總敘文字與楚辭類敘，觀察楚辭類著作在此一標準下，如何被評價、定位。

討論《總目》之學術思想，多半會注意到「崇實」此一概念的重要性，但以崇實作為討論提要內容的專著則較少。<sup>⑪</sup>曾紀剛即在《〈四庫全書〉之纂修與清初崇實思想之關係研究》之緒論提到，該書僅就經、史二部清代學術界較為重視者進行討論，而未顧及全面知識體系與崇實內涵之呈現。<sup>⑫</sup>故集部應也能以此為論述

---

楚辭批評》，《漳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總第 65 期，2007 年第 3 期，頁 62-67。

- ⑧ 陳曉華提到「寓禁於徵」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並非起初立意便以此為主要出發點。可見氏著：《〈四庫全書〉與十八世紀的中國知識份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頁 309-321。
- ⑨ 據黃愛平的觀察，《總目》在書籍的別擇取捨方面，獨對經部書籍「甄錄最寬」，對其他部則嚴於去取，此一經學觀與清廷重視所謂儒家正統有關。見氏著：〈《四庫全書總目》的經學觀與清中葉的學術思想走向〉，《中國文化研究》春之卷，1999 年 2 月，頁 89。
- ⑩ 相關論述可參蕭敏如：〈清初遺民《春秋》學中的民族意識——以王夫之、顧炎武為主的考察〉，《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 5 期，2008 年 9 月，頁 193-232。
- ⑪ 如張傳峰便曾論述《四庫全書總目》之學術思想，並指出「崇實」概念與中國 18 世紀思潮的關係。見氏著：〈18 世紀學術思潮與《四庫全書總目》的學術思想〉，《〈四庫全書總目〉學術思想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07 年），頁 303-339。
- ⑫ 曾紀剛透過比對清初思想史著作來聚焦問題，認為「崇實」是清廷因應當時環境而確定的價值

基礎。趙濤也指出乾嘉時期文學批評有反經歸本，並以復古為尚，同時也有從心學到實學的轉變，是一種詩學樸學化的表徵。<sup>13</sup>不過，集部終究與經史有別，實學也非專指經世致用之學，當一種思潮成為引領文學批評的重要基礎，當有必要重新檢視。此外，若「崇實」是《四庫全書》編纂時的重要指標，是否能用來討論「楚辭類」著作之提要，為展開分析前無法逃避的問題。對此，本文有一預設，即集部提要之纂寫必然與《總目》的思想、知識架構有關，且經過乾隆皇帝與總纂官的肯認，否則《總目》將無法體系化地進行討論。在此前提下，藉由「崇實」傾向作為架構，檢視楚辭類提要，當有可行性。惟求避免概念先行，強將「崇實」思想加諸於「楚辭類提要」之上，底下擬先對《總目》中「崇實」思想的可能指涉加以定義，並透過〈集部總敘〉、〈楚辭類敘〉來歸納其中的主要傾向，盱衡提要內容和「崇實」能否進行連結，又是如何連結。最後放回整體脈絡觀察，抉剔出館臣們對提要內容的具體批評與「崇實」的關係。

此外，因《總目》有殿本、浙本、粵本等不同版本流傳，經比對覈校後，三版本除卻版式與細微的差異（主要為異體字）外，「楚辭類提要」之內容幾同，且差異處對理解《總目》呈顯之批評視野亦無妨礙。但考量「崇實」與政治意識型態頗有牽連，為更有效勾勒《總目》屬於官方文學思想的面貌，本文乃以殿本「楚辭類提要」所載文字為研究對象<sup>14</sup>，冀能對此一課題有更清楚的觀察。

---

趨向。但學術思潮是整體現象，不可能略去集部而只籠罩經、史二部。引文詳見氏著：《《四庫全書》之纂修與清初崇實思想之關係研究》（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05年），頁4。

<sup>13</sup> 參氏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學術思想與方法論研究》（西安：西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07年），頁232-235。

<sup>14</sup> 《總目》完成後，於乾隆五十四年由武英殿刊印，是為殿本。浙本係乾隆六十年（1795）時，杭州官府又根據文瀾閣所藏殿本重刻。也有「浙本據殿本重刻」之說對此學界有不同的看法，如崔富章、司馬朝軍均認為兩者並非同一系統。然而目前無法判斷浙本與殿本之先後問題，兩派說法何者為是。就所見資料對比，文句上的差異確實存在，而時序先後與流傳廣度、影響之間有何關係，非是本文重點，茲不討論。而同治七年（1868），廣東又以浙本為底本翻刻，是為粵本。一般以為三種刻本中，以殿本最佳，以浙本流傳最廣。然而，中華書局刊行之浙本並無版心，無從詳細比較版本異同，僅能就殿本與粵本加以比對。殿本版心為單魚尾，白口，上書口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八字，魚尾下題卷次，部類名稱，葉碼，（如卷一百四十八，集部總敘，一）且部、類二者平行併排。每半葉九行，每行十九字，凡遇國朝者，則略提一格，

## 二、由「崇實」出發的楚辭批評

在今日中文學門分類中，清代「崇實」傾向以往都被放在學術史或思想經學的脈絡下討論，但晚清受到西方知識強烈刺激前，中國尚無專業分科的概念，文人身份也非思想家、文學家等辭彙就能分類定義。以之思考館臣撰寫楚辭類提要時的背景，考證訓詁、學術思想、文學批評自然也難以脫離「崇實」思想。周積明、雷平在〈清代經世思潮研究〉一文曾討論學界對「實學」的討論與反思，總括來說，清代具有「崇實」思想，但此思想是一種風氣，並非特指某個學門，也模糊了學科上的界線。<sup>15</sup>故「崇實」之「實」，不侷限於「經世致用的實學」，還包含實證（考據）、實用（經世思想）、實事實情（事理、原意）等不同面向。若承認「實」的多樣性，那麼在集部中被論述的「實」，又聚焦在哪些層次，便需要略作釐清。

四部以集部居末，從時序來看，它出現的時間最晚，從價值排序來看，其地位在清人眼中也相對較低。依照圖書出現之先後順序，集部共收楚辭、別集、總集、詩文評、詞曲等共五類，並對各類之肇端有概略式的說明。以下茲先列出〈總

---

當行二十字。粵本無魚尾，版心書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八集部總敘一」字樣，集部與總敘上下縱排，中空一格，頁碼位於版心下端偏右。每半葉九行，每行亦為十九字，凡遇國朝處，與殿本同。<sup>14</sup>然殿本葉面四周皆雙欄，粵本則僅左右雙欄。浙本因重排縮印，俱為單欄，葉面分為上中下三部份。通覽「楚辭類」提要，殿、粵本在第八葉之前，行數、字數皆無不同，惟葉九右半葉第八行，粵本與浙本同，凡二十三字，全句為「敕補繪雲從字尺木當塗貢生考天問序稱屈原放逐徬徨」，此後每行字數、起訖字，粵本與浙本同，而不類殿本。殿本當句則以「放逐」作結。浙本該句後連續三行，每行皆為二十一字，後四行又變為二十字，其後則回復至每行十九字。由於依照目前通說，殿本、浙本、粵本有前後次序上的承襲關係，故此種安排是否為此系統之特例，或其他閣本與此有別。尚待進一步觀察如文溯閣、文津閣等提要方能更加確定。這並非比對版本之重點所在，故本文不擬將所有異體字製表列出。本篇引文均出自（清）永瑤、紀昀等撰：《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第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為省篇幅，以下引文但標頁碼，不另加註。

<sup>15</sup> 參周積明、雷平：〈清代經世思潮研究〉，《漢學研究通訊》第25卷第1期，2006年2月，頁1-10。有關「實學」的討論可見該文頁4-5。

敘〉文字，以便於比對討論：

集部之目，楚辭最古，別集次之，總集次之，詩文評又晚出，詞曲則其間餘也。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書無稱屈原、宋玉工賦者。洎乎漢代，始有詞人。跡其著作，率由追錄。……四部之書，別集最雜，茲其故歟！然典冊高文，清詞麗句，亦未嘗不高標獨秀，挺出鄧林。此在翦刈卮言，別裁偽體，不必以猥濫病也。總集之作，多由論定。而《蘭亭》、《金谷》悉觴詠於一時，下及漢上題襟、松陵倡和。《丹陽集》惟錄鄉人，《篋中集》則附登乃弟。雖去取僉孚眾議，而履霜有漸，已為詩社標榜之先驅。其聲氣攀援，甚於別集。……詩文評之作，著於齊梁。觀同一八病四聲也。鍾嶸以求譽不遂，巧致譏排；劉勰以知遇獨深，繼為推闡。詞場恩怨，互古如斯。……固宜別白存之，各核其實。至於倚聲末技，分派詩歌，其間周、柳、蘇、辛，亦遞爭軌轍。然其得其失，不足重輕。姑附存以備一格而已。大抵門戶構爭之見，莫甚於講學，而論文次之。講學者聚黨分朋，往往禍延宗社。操觚之士筆舌相攻，則未有亂及國事者。蓋講學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時政，其事與權勢相連，故其患大。文人詞翰，所爭者名譽而已，與朝廷無預，故其患小也。……亦朋黨既分，勢不兩立，故決裂名教而不辭耳。至錢謙益《列朝詩集》，更顛倒賢奸，彝良泯絕。其貽害人心風俗者，又豈鮮哉！今掃除畛域，一準至公。明以來諸派之中，各取其所長，而不回護其所短。蓋有世道之防焉，不僅為文體計也。（頁1-2。引文凡出現粗體，皆為筆者所加）

檢視館臣所言：「集部之目，楚辭最古，別集次之，總集次之，詩文評又晚出，詞曲則其間餘也。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書無稱屈原宋玉工賦者。洎乎漢代，始有詞人。」從這段敘述看來，集部較經史子部晚出，「作者」概念也必須遲至漢代才被提出，此亦楚辭類提要所謂「哀屈宋諸賦，定名楚辭，自劉向始也。」伏俊璉曾由《四庫全書總目·集部》大小敘觀察其中的文學史觀與文體觀，肯定館臣將楚辭類列立一門的作法。但該文對總敘的分析不夠明確，既點明敘文將集

部分為五類，卻沒有將之與各類敘進行連結。伏氏陳述漢代之後始有文辭的自覺，文學自覺導致集部的出現與確立。<sup>16</sup>實則，總敘也清楚說明漢代是「楚辭」出現的關鍵，故「始有詞人」語，所指乃楚辭類的出現，言是作者概念的確立可能更為適合。也就是集部所收文學作品及作者等概念，乃漢代之後才出現的「實際現象」。詞人之文學作品，本無助於朝廷之經國大事，乍看之下，在以崇尚實學為基本概念的館臣眼中，似乎無法獲得較被尊重的地位。然而，若欲確定《總目》判斷集部作品優劣的標準，並藉此觀察「楚辭類」提要是否符合此一大標準，就必須比對〈總敘〉與〈楚辭類敘〉方能勾勒出更清晰的面貌。

〈總敘〉提到「秦以前書無稱屈原宋玉工於賦者」，可解釋為歷史上兩人確實不以賦名世，由「率由追錄」的角度來看，屈原、宋玉當無意以賦作傳世。所謂「當高能賦，可以為大夫」，可見賦和政治身分有關，便很難不從其功能性出發而略其文學性。騷體之作，較為突顯的是個人際遇，而非政治教化。我們在〈楚辭類敘〉中，便可見館臣對賦、騷分合之意見。其辭云：

哀屈宋諸賦，定名楚辭，自劉向始也。後人或謂之騷，故劉勰品論楚辭，以辨騷標目。考史遷稱屈原放逐，乃著離騷，蓋舉其最著一篇。九歌以下，均襲騷名，則非事實。隋志集部以楚辭別為一門，歷代因之。蓋漢魏以下，賦體既變，無全集皆作此體者。他集不與楚辭類，楚辭亦不與他集類，體例既異，理不得不分著也。

循此可知，劉向雖將屈宋之賦並為楚辭，但被稱為「騷」是後起概念。甚至認為司馬遷稱屈原著離騷，乃是舉其最著者為名。離騷為篇名當無疑義，而何時成為

<sup>16</sup> 參見氏著：〈《四庫全書總目》的文學史觀和文體觀——以集部大小序為中心〉，《閩江學刊》，第3期，2010年6月，頁129-131。總敘將《詩經》列為經部，故《楚辭》為集部之首，那麼顯然在館臣心目中，三百篇本即具有文學性，但地位更高，故列為經部。若漢代已有文學自覺概念，導致集部確立，那麼編輯《楚辭》的劉向，是以文學自覺的角度，還是以目錄學的立場，有待考察。若要以此作為文學自覺與集部緊密連結的證據，需要更多例子。

一種「文體」，則可商榷。《文心雕龍》〈辨騷〉篇，已把「九歌」、「九章」納入討論，可見至少在南朝時，騷體泛指所有楚辭類的作品，而與漢代之賦有別。此乃文學於歷史演變之情實，「漢魏以下，賦體既變」，即說明此一情況。簡言之，從文體發展之時間先後觀察，楚辭（騷）較早出現自無疑義。館臣認為騷與賦在體制上的源流關係，卻不得不加以辨析。<sup>17</sup>故可見行文中點出，司馬遷乃以離騷代稱此一體裁，泛指屈原筆下帶有楚地奇詭瑰麗風格之作，但名稱上卻不可盡稱為「騷」。從總集編纂體例論之，此類作品與其他總集內容亦不相混。可知，館臣對兩者之別，是有其判斷，所據則呈現出對循「理」求「真」的態度與精神。至於館臣對總集類作品多「詞場恩怨」的判斷，認為應「各核其實」，主張回歸文本作為參照，而非以詞場恩怨切入，隱涵文本自身之存在，為不受作者間恩怨影響的「另一真實」。

然而，總敘後半段的敘述，主要卻偏重在講學、論文與朋黨之關係，進而牽涉朝廷名教、人心風俗，又突顯「實」對清政府統治時經世致用的面向（當然，此處不排除文字背後對明代刻意貶抑的意識形態）。「蓋有世道之防，不僅為文體計」一句，前者往往被突顯，但亦不可忽略館臣對「文體」的看法。這樣的敘述應企圖在實用性與文學性間取得相對平衡的位置。簡言之，即文之為體自有必須服膺的規範，但考慮官方立場，則須斟酌「世道之防」，二者孰為更加基礎的

---

<sup>17</sup> 從文體學的角度，騷賦之間存在源流關係，而漢代是兩者分合的關鍵。《昭明文選》所收賦作，其中也包含騷體，如宋玉之作便有四首：〈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四篇作品仍夾雜「兮」字，未脫騷體，但敘述模式與大部分句式，仍可歸屬於賦體。劉勰《文心雕龍》亦將宋玉這些「雜體賦」放入〈詮賦〉、〈雜文〉討論，對文體分合之重視可見一斑。值得注意的是，《昭明文選》另立「騷體」，收宋玉〈九辯〉、〈招魂〉二作，同時也將屈原作品〈離騷〉、〈九歌〉等放入。騷賦終究有別，此館臣的想法跟《昭明文選》之編纂邏輯相近之處。館臣認為漢魏以降，賦體發生變化，屈宋所撰騷體與漢賦體制，不宜混同。參照宋玉之作被分別列入「賦體」、「騷體」，可知館臣對二類文體的關注，或可追溯至《昭明文選》的分類，認為騷、賦有所分合。然而，館臣焦點放在總集編纂時，採取的作法則與《隋書》以降目錄學著作看法一致，認為應該獨立，而不該統攝為一集。有關館臣與六朝時期對騷、賦二體的討論與觀察，於此特別感謝匿名審查人的提醒，尤其在概念上的釐清上，對筆者裨益甚大。

原則或可想見。

為突顯「崇實」作為一種批評方法的重要性，同時從徵實與空泛兩端坐為切入點，此處暫時轉開，側面觀察身為總纂官的紀昀，對「實」的詮釋為何。紀昀在《灤陽消夏錄》卷一，曾有以下看法：

余撰《四庫全書·詩部總序》，有曰：「……宋儒所爭，只今文古字句，亦無關宏旨，均姑置勿議……蓋漢儒重師傳，淵源有自；宋儒尚心悟，研索易深。漢儒或執舊文，過於信傳；宋儒或憑臆斷，勇於改經。計其得失，亦復相當。唯漢儒之學，非讀書稽古，不能下一語；宋儒之學，則人人皆可以空談其間。」<sup>18</sup>

透過這段文字，對漢人說經之法重訓詁，非讀書稽古不能為，而宋儒斟酌字句，卻往往無關宏旨，此看法恰與提要相符。可為《楚辭章句》提要為紀昀所寫之一旁證。此外，紀昀對「周易類」著作也曾表達意見，其別集中有〈周易義象合纂序〉一文，闡述對門戶之見的看法。<sup>19</sup>可以推測，無論是經部或是楚辭類提要的修纂，雖有門類上的不同要求，但在整體思想架構，應當是一致的。文字徵實與崇尚心悟各有得失，但後者更容易流為「空談」，將主觀臆測無限上綱，內在心理與外在世界的「實」造成衝突，此為紀昀評判漢宋學的重要標準，當也貫徹於文學批評一面。

再次對應在〈總敘〉中屢次出現各種相似的形容，便可更清楚地發現，館臣在兩篇敘文的批評，往往超出現代定義的「文學」範圍，而是外延至對其他部分加以判斷。事實上，集部所錄作品與後世所謂「文學」不無差距。對此，龔詩堯

<sup>18</sup> 紀昀著：《閱微草堂筆記》（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頁10。

<sup>19</sup> 紀昀著、孫致中等評點：《紀曉嵐文集》，第一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頁153-154。又紀昀對《周易》應頗為熟稔，但具體撰寫過幾篇提要，則有待翻檢紀昀別集，觀察是否有更明確的證據。至少在《閱微草堂筆記》中，他有數次藉由宋儒對《周易》的看法，表達其學術意見。對於紀昀的《易》學思想，張傳峰有相關討論，可參氏著：《〈四庫全書總目〉學術思想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07年），頁68-79。

便曾指出：

《總目》自云：「集部最雜」……因而歸入「集部」，並不完全就其本身的性質考慮：由於收錄的篇章性質兼及經、史、子，因此彼此這三部也就更為複雜。這種情況便反映在所謂「文學批評」的認定上：既然集部所收的部分作品，包括被視為經學、子學的思想餘緒或掌故實徵，那麼《總目》集部中的文字，自然不單只有文學批評，而是與思想、史學批評一爐共治。<sup>20</sup>

如概述別集類時，點出「典冊高文，清辭麗句」為其優點，又說即便刊布甚廣，仍可「翦刈卮言，別裁偽體，不必以猥濫病也」，顯然也考慮其版本及思想內容，故雖指出缺點所在，但評價時也非一味貶低。又如宋代詞學發展過程，周、柳、蘇、辛四人在詞體的轉變上有重要影響，但僅得到「然其得失，不足重輕，姑附存以備一格而已」。或可視為「實」被放在相異語境脈絡下而有不同的側重點，但關鍵或許仍在如何把內在情感、理路的「真實」，或外在社會環境，乃至具體文字、版本的「徵實」等不同標準進行取捨，並藉此斟酌其優劣。

由於館臣以為秦前無「作者」概念，楚辭類多由後人追錄，別集類數量繁多，雖文字清麗可觀，然病在猥濫。二者在圖書歷史上，屬於較為前期的發展。比較篇幅，館臣對集部類主要的意見集中在總集、詩文評，兼涉詞曲類，強調文學不應妨礙風俗世道之淳良。而總集之編纂具有一定的選錄原則，故無別集類數量之浮濫，但不表示毫無缺失。敘文特別點出自蘭亭金谷等文人雅集後，編纂成冊的作品集，開啓後世聲氣標榜的風尚。所幸「浮華易歇，公論終明」，東晉六朝至四庫館臣刪汰輯錄，共歷千餘年，所收亦不過《文選》、《玉臺新詠》等數十家。此所謂「公論」，考究其實，至少有一部份是代表清廷之官方意見，看似公允，仍充滿主觀性。<sup>21</sup>此處首拈總集內容潛藏群體相互標榜之可能。其後於詩文評類，

---

<sup>20</sup> 見氏著：《《四庫全書總目》之文學批評研究》，頁2。

<sup>21</sup> 曾守正研究《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時，對看似考據後得出之結果——即所謂「公

再次透過具體例證說明文人彼此攻訐之舉，文章之優劣居乎其間，只是朋黨運作下的結果，有賴館臣「別白存之，各核其實」。

在館臣心目中，與「實」相對者為何？從行文脈絡或不難想見。故總敘在後半段筆鋒一轉，由文學轉向門戶構爭，又以「講學」之害甚於「論文」。行為上同屬聚黨分朋，何須特別貶抑講學，筆鋒迂迴前進，逐漸逼向問題核心——禍延宗社。然而，敘文提到「講學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時政，其事與權勢相連，故其患大」，這當然並非說明論文無須辨明是非，而是論文之優劣評價與時政、權勢要清楚切割。值得措意者，當屬敘文最後痛責錢謙益《列朝詩集》顛倒賢姦，貽害人心風俗。乾隆朝首標「貳臣」，錢氏與焉，可能是館臣貶低其人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列朝詩集》具有濃厚以詩存人、存史的意圖，可說是微型明史，自屬清廷官方嚴密管制的對象。我們甚至可以說，「掃除畛域，一準至公，明以來諸派之中，各取其所長，而不回護其所短」，乃有意識地要避免當代、後世將抑制「前朝」的說辭直接對應至清廷統治，故在語言上必須展現其公正面。否則，文學作品畢竟不如講學影響力深遠，即便錢謙益為一時文壇領袖人物，但一部選集也很難動搖社稷，如此大張旗鼓，動機實不單純。

總敘所論，在楚辭類敘中亦若隱若顯，對「前朝」不無攻訐。而行文策略仍是顧文學而言其他，其文曰：

註家由東漢至宋，遞相補苴，無大異詞。迨於近世，始多別解，割裂補綴，言人人殊。錯簡說經之術，蔓延及於辭賦矣。今並刊除，杜竄亂古書之漸也。（頁2）

從表面看來，這段文字旨在說明文學詮釋的紛亂導致文本解讀上的諸多謬誤。如從歷史現實切入，東漢、中唐、北宋、晚明為歷代以來黨爭最為顯著的朝代，與

---

論」，有以下看法：「館臣的當代關懷，多集中在『公道』大彰的目標上」，「終不免設入主觀態度，其中至少包括官方權力下的一切關懷。」參見氏著：《權力、知識與批評史圖像——《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的文學思想》（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8年），頁10-11。

楚辭注本之流衍結合，則朋黨的影子似乎被削弱至無法辨認。但楚辭與錯簡說經之術有何關係，為何必須辭賦中出現「言人言殊的別解」就必須刊除？其中固然有恢復「舊本」、「古本」的版本學意義，但稍作釐清便可知，此說亦呼應總敘中黨人門戶之見，指涉對象卻很清楚是晚明講學造成的宗社之亂。

我們可以在提要內容找出更多例證說明。如館臣書寫洪興祖《楚辭補註》提要時，認為此書「異乎明代諸人妄改古書，恣情損益，於楚辭諸註之中，特為善本」，顯然「明」與「古」站在對立面。《楚辭章句》提要也有相似之語，其辭曰：「逸註雖不甚詳賅，而去古未遠，多傳先儒之訓詁」，似乎說明王逸所註雖不甚完備，但因近古而尊先儒，堪稱可信。但回到「楚辭類敘」所論，顯然並不同意王逸將九歌以下篇章冠以「騷」名，以為並非「事實」。兩者看似矛盾，卻不衝突。從價值排序來看，館臣對王逸的文體判斷或不同意，然當上述瑕疵與明代著作相對照時，則今不如古。

「崇實」或許是《四庫全書總目》之核心思想，其肌理卻以能為官方服務所用出發。故明確排斥「明末佻薄之習」（《楚辭聽直》提要）。又「蔓延及於辭賦」六字，隱然點出楚辭類敘之作者，目光所在未必是辭賦本身，而是說經之術、刊刻之誤等晚明風氣對文學產生的影響。這似乎點出，「崇實」之「實」，側重點在於「版本上」與「歷史事實上」的真實。考察兩篇敘文，大抵可知《總目·集部》呈現之「崇實」概念，包含作品內部（文本）及外部（歷史語境），從中可看出文學除卻藝術性的要求外，如世道教化、文人爭譽的實用性的功能更不容忽視。由於敘文屬於概括性的陳述，無法確定上述何種「真實」才是「楚辭類提要」所特別強調者。故欲清楚勾勒「崇實」的內涵，必須結合提要內容後，檢視館臣如何透過此一思想展開對楚辭著作之實際批評。

### 三、由實際批評剖析楚辭類著作的「崇實」思想

《總目》共收楚辭類 23 部，凡 140 卷（其中 1 部無卷數），經著錄者 6 部，列為存目者 17 部。縱觀諸篇提要，則多半先述作者生平道里，著作卷次版本內容，最後品評其短長。略觀最末之斷語，依稀可得館臣對該書之看法。分析所收

6部楚辭類著作之時代，東漢1部，宋代3部、清代2部。經存目者，僅1部為宋代註解，5部為明代，11部為清代。稍加留意，便可發現館臣撰寫清人林雲銘《楚辭燈》之提要時，以「然此說本明黃文煥楚辭聽直，亦非其創解也」作結，背後的判斷標準仍是明人著作。又，夏大霖《屈騷心印》是奠基於《楚辭燈》的基礎上，依照「譜系」脈絡，作為夏氏、林氏所依循的黃文煥，已不甚符合館臣對楚辭類作品的看法，時代稍後的著作若又被冠上「改訂」而「未善」的標籤，質地自也等而下之，很難擺脫存而不錄的命運。在集部貶低明人著作之舉本是習見現象，這是否表示明人著作便不「崇實」？假設答案是肯定的，則必須追問被批評的存目作品，是哪些部份不符合館臣眼中的「崇實」思想。欲釐清此問題，必須先透過提要文字，勾勒館臣於著錄書與存目書提要裡，較偏重的評價標準為何，能否藉此觀察「崇實」之層次與如何落實於楚辭類批評。

略為整理「楚辭類」提要之文字，能發現幾個反覆出現的辭彙。如「考證」、「考據」、「訓詁」、「舊本」、「寄意」、「寄興」、「旨趣」、「本意」、「妄改」、「好奇」、「穿鑿附會」、「武斷」，從文字脈絡，又大抵能概括成考據訓詁與本意寄託兩個主要區塊，兩者又各自可能出現穿鑿附會，以意為之的情況。以下分別論述之。

### （一）考證訓詁

若將朱子視為分水嶺，此前的王逸與洪興祖，皆以考據訓詁為館臣所稱許，其中如「去古未遠」、「古韻」、「不妄改古書」等評語，可以肯定是從考據版本的角度出發，大抵依循愈古愈好的版本概念。但在朱子之後，楚辭類註本的情況似乎每下愈況。其中品質較佳者，雖有考證訓詁，但卻不免作意好奇，如吳仁傑一一將草木對照為實物，並以《山海經》為基礎進行考辨。在方法上，符合館臣稱許的徵實方法，卻忽略了楚辭的文學性在於寄興：

其大旨謂《離騷》之文，多本《山海經》，故書中引用，每以《山海經》為斷……駁王逸舊註之非。其說甚辨。然騷人寄興，義不一端。瓊枝、若木之屬，固有寓言；澧蘭、沅芷之類，亦多即目。必舉其隨時抒望，觸

物興懷，悉引之於大荒之外，使靈均所賦，悉出伯益所書，是澤畔行吟，主於侈其博瞻，非以寫其哀怨，是亦好奇之過矣。以其徵引宏富，考辨典核，實能補王逸訓詁所未及。以視陸璣之疏《毛詩》、羅願之翼《爾雅》，可以方軌並駕，爭驚後先，故博物者恒資焉。跡其賅洽，固亦考證之林也。

等而下者，如著作被列為存目的楊萬里，從方法來看，他確實以考證來糾謬王逸註的不足，卻被認定不是出於一己之觀察，而是掇拾柳宗元〈天對〉的說法。有所依據未必就能獲得館臣認同，同時還要能「別有新義」：

其間有所辨證者，如〈天問〉「雄虺九首，儵忽焉在」，引《莊子》「南方之帝曰儵，北方之帝曰忽」，證王逸註「電光」之誤。特因〈天對〉「儵忽之居帝南北海」而為之說。又如〈天問〉「鯀魚何所，魀堆焉處」，獨謂「堆」當為「雀」，「魀雀在北號山，如雞虎爪食人」，證王逸註「奇獸」之誤。亦因〈天對〉「魀雀在北號，惟人是食」而為之說。未嘗別有新義也。

其間的差距頗為幽渺，既必須有所依據，同時更要具備新意，且不能過於武斷、以意為之。不可不謂難矣。若說南宋之作猶有考證，時至明代，非但失於考證，且篇章竄亂，大異古本。

在許多篇提要裡，均可見考據相關辭彙反覆出現，館臣似乎認為此乃註解楚辭的重要進路。與此相對，《楚辭燈》以「時文之法」的詮釋方式，顯然不為館臣所喜。「時」與「古」於焉成為對立概念，加上林雲銘「詞旨淺近，蓋鄉塾課蒙之本」，價值更低。又如屠本峻《離騷草木疏補》一書，本為補充吳仁傑所撰，卻「自相刺謬，失於考證」，無法與前代註本相匹配。其中最為武斷者，則莫過於顧成天《離騷別論》：

其說皆不免武斷。至〈思美人〉篇「託元鳥而致詞」句，謂因張儀生出「鳥」字，因商於生出「元鳥」字，其說尤不可解矣。

從提要揭示之可知，此書望字生義，過度詮釋乃至全不可解。因為「鳥」字而將張儀、殷商拉入註解系統，或許「別有新義」，但已溢出「徵實」規範。與顧成天有別，另一種館臣貶斥的情況偏向道德面，即「攘善」的行為。如劉夢鵬在方法上完全符合考訂詳悉的原則，卻未註明出處，悖於學術倫理。館臣評曰：「是書就諸本字句異同，參互考訂，亦頗詳悉。然不注某字出某本，未足依據。」這種雖有依據而未足依據者，也在被摒退之列，況劉氏《楚辭章句》猶有篇章次第竄亂之失。

版本問題留待下文進一步討論，但若由考據者所本為何的角度出發，提要確實點出考證訓詁必須以善本為底本。如館臣評夏大霖《屈騷心印》便以此入手：

因林雲銘《楚辭燈》而改訂之。據其自述，自林本以外，所見惟朱子、來欽之、黃維章三家本。其論韻稱沈約為晉人，所引據者亦不過李漁《笠翁詩韻》、蔡方炳《廣輿記》諸書。前有毛以陽評，謂朱子未暇注《楚辭》，今本出後人之附會，尤不知何據也。

依照提要可知，夏大霖所見版本有四，其中便包含朱子所註，然而他卻依循林雲銘所說為底本。又，考辨音律及沈約之時代，判斷基礎「亦不過李漁《笠翁詩韻》、蔡方炳《廣輿記》諸書」，李漁及蔡方炳皆為明清之際文人，「亦不過」三字，隱約流露出輕蔑口吻，似乎認為二書沒有說服力。且提要指出林雲銘不少說法承襲自黃文煥，而黃文煥《楚辭聽直》雖奠基於王逸、司馬遷之說，但篇次「與舊本異」，實非館臣心目中理想的善本。

篇章竄亂屬於版本的問題，也是明人楚辭註本遭受批評的重要原因之一。略為比對二十三篇提要，可以發現，被視為善本，且屢屢拿來與明代後註本進行比較者有三，分別是王逸、洪興祖與朱子。明代版本之優劣，似乎都是透過王逸等人的版本作為判斷。此時，可以思考當回到歷史情境之現實，明人版本情況到底為何，與館臣所言是否相應。所有提要中篇幅最長者，為沈雲翔所撰《楚辭評林》，內容為「是書成於崇禎丁丑。因朱子《集註》，雜采諸家之說，標識簡端，冗碎殊甚。蓋坊賈射利之本也。」其中關鍵處有三，而彼此牽連：一是成書年代；

二是雖因朱子之作，但標示簡端，內容冗碎；三是書坊射利之本。

潘美月便指出：明代中葉以後，刻書事業漸漸會聚於蘇州，晚明時南京、杭州及歙縣三處，書坊亦蔚然而起，這是明代各地書業盛衰的大概。……且隆慶、萬曆以來，刻書者往往不重校勘，乃至任意刪節內容，於是謬種流傳，致使清人發「明人刻書而書亡」之嘆。<sup>22</sup>

若結合時文、評點與書坊之關係，更可明顯看出館臣對將文學視為功利追求的工具，其實頗為不滿。加上評語多半標示於簡端，從林雲銘《楚辭燈》至沈雲翔《楚辭評林》，提要雖未明確指出書坊刻書與評點之關係，然而回到歷史情境，不難明白這樣的觀點，有其時代的針對性。根據侯美珍的研究，明清對時文評點的評價，正反兩面皆有。並將反對的理由歸納為十一點，其中不少意見與提要呈顯之思想相近，如「評點為時文陋習」、「評點非古制」、「評點未能得作者之意」、「評點好論字句等末節」、「評點者批書常流於率意主觀」、「評點本常有改易、刪節之舉」、「評點將導致文本改變」等。<sup>23</sup>其中可開展的議題頗多，但聚焦於楚辭類提要，除前文所論與「時、今」對比、版本字句有關之處外，對於作者之意與註解者之意的討論，也是館臣念茲在茲的議題。原意牽涉如何詮釋文本比較接近真實的問題，值得拈出討論。

## （二）本意寄託

總綰諸篇提要，可知屈原作品的本意從王逸後大抵已被確定為忠愛纏綿，而此一「本意」，基本上也為館臣所認同。<sup>24</sup>略為統計楚辭類提要直接提到「本

<sup>22</sup> 此處參考潘美月的說法，見氏著：〈明代官私刻書〉，原載《古籍鑑定與維護研習會專集》（臺北：中國圖書館學會，1985年），今收入氏著：《龍坡書齋雜著——圖書文獻學論文集》中冊（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11年），頁407。

<sup>23</sup> 參侯美珍：〈明清士人對評點的批評〉，《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研究》（附錄一）（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年），頁297-312。

<sup>24</sup> 在《欽定補繪離騷全圖》一書提要中，亦有「而靈均旨趣，亦藉以考見其比興之原」語。考其旨趣，則當為忠臣去國懷鄉之情，亦即所謂「寓宗臣之貶」。於是當汪瑗自出新義，反對歷來將屈原憂心朝廷而自沉的舊說時，提要稱之「疑所不當疑，信所不當信矣」。

意」、「靈均旨趣」者共有五處，提到「寄意」、「寄興」、「寄托」者則有四處<sup>25</sup>，但其中有兼涉本意與寄託的例子，則多採取反對意見。唯一別有寄託卻獲得正面肯定的，是朱子所編撰之《楚辭集註》。探求原因，或與朱子之寄意乃出於個人真實情性，同時該書又重在「明天下之大戒」。「天下之大戒」，蓋指儒家文化視野下的屈原詮釋。放回《楚辭》詮釋史對屈原的接受來看，何謂離騷本意，可能逐漸形成某種共識。尤其是發展到朱子時，溫柔敦厚的忠貞綱常已被定型為「靈均本意」。如廖棟樑所論，在朱熹看來，王逸、洪興祖「或偏執於主體的情感而損害儒家義理，或強調道德倫理而無是詩人內心的憂悲愁苦」<sup>26</sup>，都不能探求屈騷之旨。《楚辭集註》提要曾引朱子自序：

《自序》謂：「欲因《反騷》而著蘇氏、洪氏之貶詞，以明天下之大戒也。」周密《齊東野語》記紹熙內禪事曰：「趙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熹為之注《離騷》以寄意焉。」然則是書大旨在以靈均放逐寓宗臣之貶，以宋玉《招魂》抒故舊之悲耳？固不必於箋釋音叶之間，規規爭其得失矣。

借周密《齊東野語》所載趙汝愚事<sup>27</sup>互為表裡。館臣認為《楚辭集註》實乃別有寄托而作。趙汝愚忠愍為國，而遭權相所放，朱子政治理念與之相投，在政治上又為趙氏所拔擢，最後同遭迫害。館臣述其藉《集註》抒發逐臣之感、故舊之悲，實與其他作意好奇，刻意別出新解者不同，故敘文最後以「固不必於箋釋音叶之

<sup>25</sup> 此統計已明確標出本意等辭彙者為主。如黃文煥《楚辭聽直》之提要云：「借抒牢騷，不必進屈原本意」，借抒牢騷四字，帶有黃文煥自身的寄興，然而字句未直接揭示，故暫不計入。但依舊能藉以看出，館臣對作者寄託、本意，註解者寄興等問題，有相當程度的重視。

<sup>26</sup> 詳細論述，可見廖棟樑：〈建構、定型與深化——論儒家文化視野中屈原研究的詮釋策略〉，《倫理·歷史·藝術——古代《楚辭》學的建構》（臺北，里仁書局，2008年），頁21。

<sup>27</sup> 趙汝愚為權臣韓侂胄藉口雖為宗室，而將不利於南宋政權，故遭貶永州，行至衡州時暴卒。史稱慶元黨禁。《宋史》以為是遭韓氏遣衡州太守錢鞏害之，後侂胄被殺，趙汝愚才得以平反，賜諡號「忠定」。

間，規規爭其得失矣」作結，旨在突顯朱子性情面之真與正，絕非文字章句間的考辨徵實所能框限者。但饒有意趣處在於，朱子「性情之真」，又必須靠對生平加以「徵實」，透過在與南宋奸黨角力的過程，突顯忠心為國的形象。而前文述及吳仁傑被館臣批評的原因，正在過度重視作品描寫事物的「真實性」，將《楚辭》中的植物，都看成是屈原寓目所見後寫下的現實景象。

此處推測，吳氏所以被批評，乃在於從物象之「真」無法推導出屈原性情之「正」，僅將別有寓意的植物確指為創作時存在現場者。有別於吳仁傑之註解，把「本意」視為實際發生之事而為館臣所貶者，可以顧成天為例。顧氏並不同意王逸以降香草美人的託喻傳統，而企圖將寄託逐一指實對應屈原生平面對之人事，但文學作品的本意無法等同於「本事」，更未必是歷史上實際發生之事，容許一定的虛構空間，故探求「本意」之重點在於作者內在情感是否真實。與其他篇提要對照，更能彰明《總目》重視知人論世的程度，並以註解者的遭遇作為是否真有寄託的判斷。故考察屈原本意，必然要從騷人流放南方，不得輔佐君王的忠貞之意為基礎，詮釋時更應避免脫出這樣的脈絡而胡亂臆測。此時考據生平之「真」，便能順利轉化成忠愛纏綿之「正」。可知館臣對《楚辭》的理解，已先接受了一套預設的「本意」架構，將作者與作品緊密結合。

但檢視「楚辭類」提要，館臣對其他預設的詮釋方法，又多所批判。如林仲懿《離騷中正》與屈復《楚辭新註》便屬於概念先行的詮釋方式，導致背離館臣肯認之「本意」。前者從理學的角度來闡發〈離騷〉，認為當中有執中守敬的思想，把文學作品變成《四書》註腳，而有迂腐穿鑿之評；後者雖非透過說理進行註解，然而預設立場便枉顧屈原之遭遇、性情，但憑己意臆測，而致「變亂」之譏。

不過，當個人經歷、性情導致註解不盡合於屈原本意時，館臣也未加苛責。如黃文煥《楚辭聽直》提要：

崇禎中，文煥坐黃道周黨下獄，因在獄中著此書。蓋借屈原以寓感。……又據王逸之注，以〈大招〉或稱屈原。又據司馬遷〈屈原賈生傳贊〉有「讀原〈離騷〉、〈招魂〉、〈哀郢〉」語，並以〈大招〉、〈招魂〉附於篇

末，與舊本皆異。……大抵借抒牢騷，不必盡屈原之本意。其詞氣傲睨恣肆，亦不出明末佻薄之習也。

黃文煥坐黃道周案下獄，故《楚辭聽直》為抒發牢騷之作，符合他本身際遇，是以提要轉而批評該書「詞氣傲睨恣肆，亦不出明末佻薄之習也」。依照總敘所言，清代官方對於朋黨態度頗惡，黃文煥既坐黨禍下獄，卻非在朋黨一事上被批評，蓋與他忠心為國的形象有關。相似案例，從朱子與趙汝愚之關係便可略見一斑。乾隆之後，清廷政權早趨穩固，也開始評價明末以來的忠臣與貳臣，對晚明義士的褒揚，既可標榜自身的公正形象，也可作為清人鑑戒。<sup>28</sup>此時，若反面思考，朋黨對國家統治有正面效果，是否就相對能令清人接受呢？究其實，館臣概已接受溫柔敦厚這套穩定的詮釋進路，排除其他詮釋空間，尤其對明清著作充滿一種「偏見」。<sup>29</sup>若承認《四庫全書》之編纂，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於符合統治者之「實用」（此處所指，不等同於經世致用），那麼有無朋黨本身或許不是最關鍵的問題，而是總敘提到那些相互標榜、危害宗社的朋黨才應該被嚴格禁止。<sup>30</sup>

整體來說，考證注疏者生平際遇只能得「性情之真」，未必能求「性情之正」，然而館臣透過知人論世之法，將人之才學性情帶入實際批評的架構內。姑且不論將作者境遇與文本相互詮釋的操作方法，是否容易流為循環論證<sup>31</sup>，我們依

<sup>28</sup> 有關《四庫全書》之編纂對明末降將與貞烈之士的看法，乃參考陳曉華之說。見氏著：《《四庫全書》與十八世紀的中國知識份子》，頁299-300。另，陳曉華曾分析《四庫全書》中「理學與朋黨」之關係，認為理學在發展初期對維護清皇朝之統一，頗有助益。但到後來，其本身的虛偽性使其弊端愈發突出，最後更由理學而致朋黨，成為統治的障礙，遂引起皇權的警惕。

<sup>29</sup> 偏見一辭，主要參考朱鴻林的說法。他認為部分對所收著作的不公平來自於官方的學術系統與意識形態，部分則源於撰寫提要者本身的強烈主觀性。參見氏著：〈《四庫提要》所見盛清學術偏見一例〉，《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6卷，2006年第4期，頁48-53。

<sup>30</sup> 順治十七年（1660）清廷曾下詔禁止結社，一方面擔憂其從文學社團轉為政治社團，一方面也不喜相互標榜之風氣。然而，實際上，有清一代，文人結社的情況從未停止過，而詩社、詞社等文人社團也並未遭受強烈的迫害或嚴禁。

<sup>31</sup> 關於以「知人論世」與「以意逆志」進行文學作品詮釋時，可能發生的方法謬誤，可參見顏崑陽：《李商隱詩箋釋方法論》（臺北：里仁書局出版社，2005年修訂一版），頁107-130。尤其是以生平作為判定作品的操作策略，顯然是偏向了「史」的立場。而李商隱詩在清代被接受

舊能在館臣評價朱子或黃文煥時，看出提要有意「真」導向為「正」的努力。是以，若朱子「性情之正」得以彰顯時，便非字句音韻訓詁所能框限。即便對明末風氣多所批評，卻也未曾貶抑黃文煥「以己意求之」的注解方式，僅拈出其文字佻薄之處。

#### 四、結語

孫紀文曾概括《總目》所遵循之批評話語形式，認為大體可分為三種：儒家傳統批評話語、審美批評話語、學術批評話語。其中儒家傳統批評話語乃針對正統利益之維護，讚揚忠君愛國的官方意識形態。至於審美批評話語的部份，館臣雖重視儒家對群體性之性情，但也接受作家個體的情感抒發。而學術批評話語又以考辨的話語，平心而論的持平話語兩種為主，對於古籍特徵、版本真偽、品鑑眼光等，均展現出實事求是的理念與無信不徵的態度。<sup>32</sup>這段分析，頗能忠實呈現館臣在「楚辭類存目」提要時，於文學審美與版本考徵的微妙調和，企求在能為清廷所用的前提下，達到平衡的努力。不過條分縷析後，仍可看出楚辭類提要於評價時，標準有其先後順序。綜前所論，可得下列結論：

一、就目前所及，《總目》學中對楚辭類的研究有待開展。假設「崇實」思想為清代官方操持編纂工作的主流觀念，那麼其內涵為何，又是如何展現於對楚辭類著作的批評上，歷來卻少有學者討論。若「崇實」是一種風氣，那麼它可能涵蓋哪些層面，本文考察集部〈總敘〉及〈楚辭類敘〉後，認為至少包含實證（考據）、實用（經世思想）、實事實情（事理、原意）等不同面向。但兩篇敘文是整體性的概括，未必符合提要所欲表達的細節。故若要確定館臣如何以之作為楚

---

的過程，正可作為我們側面理解「楚辭類」提要中，以作者際遇生平來理解作品的進路。當王逸以降的比興傳統成為《楚辭》詮釋的前理解，由朱子與黃文煥兩個對照例證出現，恰可看出館臣如何從考察註解者生平際遇之真，轉而引伸出性情之正。

<sup>32</sup> 此處對《總目》批評話語的討論，濃縮孫紀文之說，見〈《四庫全書總目》文學批評的話語分析〉，《江西社會科學》，2007年7月，頁235-243。

辭類提要撰寫時的前理解，則必須檢視提要內容如何進行實際批評。

二、分析 23 篇提要，大致可歸納出館臣聚焦處在於「考證訓詁」及「本意寄託」兩方面。其中又牽涉版本、文學、功利等觀念。〈總敘〉所言關於世道教化、講學亂國等政治實用標準，在這裡似乎被削弱。如果從學術公正的立場觀之，明清楚辭類著作確有不少校勘未精、別出新意者。這些註解作品或流於空疏，或流於臆測，在「崇實」標準下遭受貶退，應不難想見。而考據嚴謹與否作為所有楚辭類著作的基本原則，卻非第一義。於提要中，當訓詁過於指實而與本意相違時，符合「靈均旨趣」反而更為重要。此現象說明文學性並未被拋棄，而是從「知人論世」的角度，考索作者實際經驗與生平，作為詮釋文本的原則。

三、檢驗朱子《楚辭集註》與黃文煥《楚辭聽直》兩篇提要，可以發現當註解者別有寄託，館臣企圖從「性情之真」導向「性情之正」，凡符合此一標準者，即便無法完全符合字句訓詁的考據要求，仍被稱許、包容。這種放寬標準的行為，必須放在忠君愛國、溫柔敦厚的前提下。簡言之，也就是能為清廷樹立貞節典範。故即便朱子與黃文煥之際遇與朋黨有關，但重點反而不在朋黨本身，而是兩人如何站在奸黨的對立面，突顯忠心為國的生平際遇。故朱子牽涉趙汝愚案一事寫得頗為隱微，黃文煥的部分雖明言坐黃道周黨，該書招致批評之處卻是詞氣佻薄，與其人無涉。

## 引用文獻

### 一、古籍

清·永瑤、紀昀等撰：《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第 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清·紀昀：《紀曉嵐文集》第一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 年〉

### 二、近人論著

〔日〕笈文生、野村站子：《四庫提要北宋五十家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2 年）

〔日〕笈文生、野村站子：《四庫提要南宋五十家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6 年）

- 陳曉華：《《四庫總目》學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年）
- 陳曉華：《《四庫全書》與十八世紀的中國知識份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
- 張傳峰：《《四庫全書總目》學術思想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07 年）
- 曾守正：《權力、知識與批評史圖像——《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的文學思想》（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8 年）
- 曾紀剛：《《四庫全書》之纂修與清初崇實思想之關係研究》（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05 年）
- 廖棟樑：《倫理·歷史·藝術——古代《楚辭》學的建構》（臺北，里仁書局，2008 年）
- 趙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學術思想與方法論研究》（西安：西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07 年）
- 潘美月：《龍坡書齋雜著——圖書文獻學論文集》（中冊）（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11 年）
- 顏崑陽：《李商隱詩箋釋方法論》（臺北：里仁書局出版社，2005 年修訂一版）
- 龔詩堯：《《四庫全書總目》之文學批評研究》（臺北：花木蘭出版社，2005 年）
- 三、單篇論文
- 包根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歷代詞家評論探析〉，《輔仁國文學報》，第 9 期，1993 年 6 月，頁 53-108。
- 伏璉生：〈四庫全書總目的文學史觀和文體觀——以集部大小序為中心〉，《閱江學刊》，第 3 期，2010 年 6 月，頁 129-131。
- 朱鴻林：〈《四庫提要》所見盛清學術偏見一例〉，《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6 卷，2006 年第 4 期，頁 48-53。
- 何宗美、劉敬：〈《四庫全書總目》中的明代文學思想辨析〉，《江西社會科學》，2010 年第 9 期，頁 102-111。
- 李金善：〈楚辭學史的濫觴——《四庫全書總目》之楚辭論〉，《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4 卷第 1 期，1999 年 3 月，頁 54-57。
- 周積明、雷平：〈清代經世思潮研究〉，《漢學研究通訊》第 25 卷第 1 期，2006

年2月，頁1-10。

孫紀文：〈《四庫全書總目》中的詞籍批評〉，《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第27卷第6期，2006年11月，頁161-164。

孫紀文，〈《四庫全書總目》文學批評的話語分析〉，《江西社會科學》，2007年7月，頁235-243。

郭丹：〈《四庫全書總目》中的楚辭批評〉，《漳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3期（總第65期），2007年，頁62-67。

黃愛平：〈《四庫全書總目》的經學觀與清中葉的學術思想走向〉，《中國文化研究》春之卷，1999年2月，頁85-91。

曾聖益：〈從《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看中國詩文論著之特性〉，《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館刊》第2卷第2期，1995年12月，頁67-75、第2卷第3期，1996年3月，頁48-53。

曾守正：〈被隱藏的聯繫性：《四庫全書總目》唐代別集提要的文學史敘述〉，《淡江中文學報》，第21期，2009年12月，頁119-152。

曾守正：〈複述與新塑：《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清帝御定書〈提要〉的文學思想〉，《書目季刊》，第41卷第2期，2007年9月，頁67-88。

廖棟樑：〈《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敘》對文學批評的認識〉，《輔仁國文學報》，第9期，1993年6月，頁109-131。

鄭柏彥：〈中國古代選本中「古」義的內涵、特性及其衍生的批評效用——以《四庫全書》「總集類」為研究範圍〉，《嘉大中文學報》，第3期，2010年3月，頁245-271。

蕭敏如：〈清初遺民《春秋》學中的民族意識——以王夫之、顧炎武為主的考察〉，《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5期，2008年9月，頁193-232。

#### 四、學位論文

侯美珍：《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年）

薛建發：《〈四庫全書總目〉文學鑑賞研究》（臺北：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應用語言文學所語文教學碩士學位班碩士論文，2006年）

盧盈君：《《四庫全書總目》詞曲觀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

# **Realism as a Literarily Critical Approach-On the “Comprehensive Table of Contents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Literary Thought Manifested in the Category of Chu Elegies**

*Hsu, Chia-Wei*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paper aimed to probe into the literary works in the category of Chu Elegies, which have been relatively underrepresented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Comprehensive Table of Contents Study” to date. In the present paper, Chu elegies were analyzed in terms of Realism, a weighty ideological trend in the compilation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Climate as Realism was at the time, it was practiced in different domains and fields and could be drawn on as a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From ‘Zong Xu’ and ‘Chu Ci Lei Xu’ in the *Ji* Branch of literature, it was found that the idea of realism prevailed in such works. Based on the examination of the semantics of the text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is approach proffered an insight into the human nature and society at the time. It is clear that besides its artistic requirements, literature has such pragmatic functions as enlightenment and bookmen’s means of achieving fame.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two texts, the present study re-examined the synopsis of Chu Elegies and discussed the embodiment of Realism as well as the lexicon that those textual annotators used for textual criticism. It was found that textual semantics and reality-based interpretations were two main domains focused on, with the former on the linguistic elements of the texts and the latter on the reality of the authors' and annotators'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dispositions. In short, those annotators' efforts could be seen in the harmony of literary aesthetics and textual semantics,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balance of the texts under the premise of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annotation by Ching Dynasty. Given the comments on the textual synopsis, when the textual criticism conflicted with the original semantics of the texts, the latter was favored over the former. This approach closely related the texts to their authors (and the annotation to their annotators), which manifested fidelity and affections and helped to lead to the unity of Ching Dynasty.

**Keywords:** synopsis of the comprehensive table of contents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Chu Elegies, Realism, textual semantics, reality-based interpretations